

叶子龙

回顾给毛泽东做秘书的日子

叶子龙：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从事机要工作，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出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从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一九六二年调离中南海，前后达二十七年。一九四九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一九五三年，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一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成为“五大秘书”之一。

叶子龙
简历

——九五三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弹指四十余年，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数年前，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队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飞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

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浮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六二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叶良和变成了叶子龙
黄公略“偏师”中的“娃娃兵”
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

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全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浏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青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

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一九一六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一九二六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十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八月二十三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十三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四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

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

“是的，一九三二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一九三五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八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

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一方面军，并一直随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毛泽东提议，机要股升格机要科
黄有凤不管转交电文了
我们那时用的密码称“豪密”
毛泽东批评一方面军的山头主义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三个月，歼灭国民党七个团，俘虏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红军扩军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

差错，所以他提议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做‘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

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议后，黄有凤调往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是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吴亮平给毛泽东当了一段秘书毛泽东又看中了他的
一位老乡

据叶子龙回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秘书。的确，笔者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中共早期的秘书工作，是由中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例如周恩来，就做过许多如今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记载里，“秘书”字样最早见于 1923 年 4 月，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到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了两个月，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又兼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处理文书、会议记录、保管档案等工作。

国共分裂后，武装斗争转为中共工作的中心。运筹指挥战

事，均由军队领导人当机决断，指挥部里只有个别领导有参谋，但参谋的职责只是发转电文，相当于后来的机要秘书。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领导者地位后，也没有配置秘书。

一九三六年夏秋，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同他会面交谈时，一直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做翻译，兼干了一些秘书工作。但当斯诺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吴亮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几乎与此同时，和宋子文、陈立夫委派的代表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周小舟，从南京来根据地汇报情况。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老乡十分欣赏，随即要他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但不久就派他以毛泽东私人代表身分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去了。一九三七年春他刚返回，旋即被毛泽东派往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上述几位短暂地居于秘书位置的人物，并不曾经常在毛泽东的身边。而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毛泽东拿着叶子龙看不懂的电报说：
要有好事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了张国焘
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十二月十二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十二月十一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离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两位女性。

肖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到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

《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传说在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

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芷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共产国际给毛泽东派来了一位参谋
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
王若飞一个劲地骂机会主义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便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时间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项英从江苏发来电报，涉及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
毛泽东说：有问题康生会告诉我，不必大惊小怪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

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

一九三九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一九三九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

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正式提出设秘书 任弼时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办的第一件事 后来的五大秘书，都到了毛泽东身边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三九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约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

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来也是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文章外，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

时至到陕北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党员从四万增加到八十万，军队从四万扩充到五十万，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且日趋庞大。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干，并为各单位熟悉、尊重的干部，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和毛泽东商议后，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那以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叶子龙回忆说：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报告，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等等，此